

仍是个民族英雄，万一被打败，也仍是抵抗外侮的英雄。如果谈和，结果不堪设想。”这些话气得汪精卫目瞪口呆，坐立不安。蒋介石权衡利弊得失后，一则不敢上日本人的当，一则是“西安事变”刚过，自己言之凿凿，岂可立即又打内战？于是，蒋拒绝了日本的和平条件，并和：“以后再不要提和平二字了。”

汪精卫只好自己下水，单独去当汉奸了。日本方面，正在等候回音，汪就命令梅思平，再到香港答复今井武夫三点：(1)、汪承认上海“重光堂会谈”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；(2)、为响应汪的行动，日本近卫首相相应发表声明，支持“重光堂会谈”的内容；(3)、汪预定十二月八日，从重庆出发，到达昆明，再去河内。为了绝对保守秘密，新的近卫声明应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发表。

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确在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，提出“中日亲善、共同防共、经济合作”，这就是有名的“近卫三原则”。但对撤兵一事，只字未提。此时，日本军部的强硬派正占上风，“鸽派”无计可施。

汪精卫和陈璧君、周佛海、陶希圣、曾仲鸣等，于12月19日到达越南河内，几天后得知“近卫声明”，颇为失望，因关键的撤军问题，得不到任何保障。但为了讨好日本，汪于12月29日发表了《艳电》一文，公布了蒋介石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日本谈判的会议纪录。

汪精卫在河内，矛盾彷徨，曾于1938年12月30日向日本秘密提出要求：(1)、日本在日华和平实现前，不要和英美等国引起争端，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；(2)、日本加紧对长沙、南昌、西安等地，发起进攻，以获得必要的政治效果；(3)、日本应同时彻底轰炸重庆，逼蒋介石下野；(4)、对撤军一事应有明朗的态度。

但1939年1月4日，日本近卫内阁即告总辞职，汪未得到有效的保证。蒋介石命令戴笠加紧刺汪，终于在3月21日发生了有名的“河内暗杀”(汪未刺中，却打死了汪最亲信的曾仲鸣)。汪夫妇一怒之下，即从河内到了上海，完全公开其汉奸活动了。

至此，抗战初期的日、蒋、汪的绝密活动，即告结束。以后，就是汪精卫公开成立伪政权了。



▲蒋介石与蒋经国、蒋纬国。



▲蒋介石与二公子蒋纬国。

蒋介石的家事

“遗嘱”



▲蒋介石与蒋经国、蒋纬国。

1975年4月5日,正是“欲断魂”的清明时节,蒋介石病死于台湾台北士林官邸。在此之前的3月29日,蒋大概感到自己行将就木,便口授遗嘱,由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。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、严家淦、蒋经国、倪文亚、田桐锦、杨亮功、余俊贤。

蒋死后,公布了遗嘱内容:“余自束发以来,即追随总理革命,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,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,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,艰苦奋斗……”一番冠冕堂皇的话,接下来又高唱一通“反共救国”的陈词滥调。这篇200余字的遗嘱公布后,立即招来岛内外诸多讥讽,有人说它乱用成语典故,文理欠通;有人说它乱排座次,把耶稣基督列在孙中山之前,岂有此理;更有人说遗嘱未经本人签名,依“法”无效。

不过,就遗嘱本身来说,论者一般均以为这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所立之政治遗嘱。至于是否另立过家事遗嘱,不得而知。但笔者怀疑,蒋介石早年迭遭性命之虞,期间有军阀追杀,有刺客暗枪,亦有抗日爱国军人的“兵谏”,如东征时险丧吕公望之手,执掌黄浦军校时差点挨上暗枪,至于后来的孙凤鸣刺杀案、西安事变,无不是差点要了他老命的。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,使他不能不对家庭、对子女有所顾及,所谓“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”,如果说他那时就有遗嘱,尤其是家事遗嘱,恐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,只是笔者未及详查这方面的史料,不敢下断语。但忆及以前所见之蒋氏书信,有二通似与“遗嘱”有关,不妨略作介绍,以资谈助。

1936年10月,蒋纬国赴欧留学。蒋介石对纬国甚宠,有“经国可教,纬国可爱”之说,故对他的远行很不放心。于是,一一叮嘱,说既经立志留学,就要安心向学,也不要谈女朋友,毕业后方得回国,不可半途而废,“即使家中无论有何大事,你皆可不必回国”云云。最后说:“我之手稿要件均托毛勉庐先生管理,万一有何事故,你可向其请教,我此时尚无遗嘱,如果将来要写遗嘱,当存于毛先生或周枕琴先生处,你可放心。”

· 怀蔡

马叙伦 · 章太炎 与章太炎墓

毛思诚,字勉庐,奉化岩头人,为蒋介石之启蒙老师,以后又在蒋身边工作过,曾充黄浦军校秘书等职。蒋对他信任有加,十分尊敬,曾将数量可观的手稿、日记、公牍和函件等托付其秘藏。(有名的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先生》及《自反录》等书,就是毛思诚根据这些档案资料编纂而成)故有以上诸语。周枕琴虽非蒋之老师,但因其兄周枕棋是龙津校长,所以蒋对他也执师礼,关系非常密切。

这番话,细细琢磨,似也隐含着某种交代后事的意味,称得上是一份不是遗嘱的“遗嘱”。但蒋自称是“尚无遗嘱”,说明他在1936年10月之前,还没有写过遗嘱。二个月后,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。如果蒋氏有预见的话,或许倒会留下一份货真价实的遗嘱。

其实,恐怕蒋介石本人也忘记了,早在1921年冬,他已有过一份“遗嘱”。这年5月,孙中山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,就任非常大总统,事业万端,亟待用人,但深得孙器重的蒋介石却在上海做投机生意,或者到老家溪口游山玩水。孙中山以及胡汉民、廖仲恺、戴季陶等人函电交驰,催促他去广州任职,均被他婉言拒绝。即便到了广州,呆不了几天又要回转去。其中主要一个原因,就是嫌官太小。1921年6月蒋介石母亲王氏病逝,延至11月23日葬毕,蒋介石这才赶赴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北伐。临行之前,蒋介石仿佛抱定“有去无回”之决心,给蒋经国、蒋纬国各留下一份内容相同的家书,寥寥数语,但口气沉郁。他交待说万一发生变故,他的所有财产除丰镐房老屋归原配毛福梅管理外,其余产业可由他们两人均分。兄弟之间“不可争执”,要互谅互让,以全手足之情。当时,蒋已纳姚冶诚、陈洁如两房侧室,但信中只字未提,看来他们在蒋介石心目中的,确不占有重要位置,至少不是“自家人”。

只是后来蒋介石大难不死,这份家事“遗嘱”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章太炎先生祖籍浙江青田,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和革命党人,有“章疯子”之称。马叙伦先生出生于浙江杭州仁和县,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,而且性格刚烈,对邪恶势力不屈不挠,似也与章太炎不相上下。马叙伦对章太炎十分敬重,两人堪称莫逆之交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留下许多生动的故事。

章太炎早年立志攘夷匡夏,在近代文人中最佩服的,除了昆山顾亭林以外,还有他的乡先哲刘基。“闻君著籍青田,故诚意伯刘公则乡之令望,而中国之元勋也。平生慕之久矣。”当章被袁世凯禁闭在北京时,他以绝食求速死,并写信给友人求刘基墓地左近置一生圻,以死后即归于彼,信曰:“人寿几何,墓木将拱,欲速营葬地,与刘公墓相连,以申九原之慕,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。君既生长其乡,愿为我求一地,不论风水,但愿地稍高敞,近于刘氏之兆而已。”据沙孟海先生说,这封信在当时传颂一时,他也曾能背诵。此后刘基后裔刘曜东答允了章太炎的请求,并说“周墓之旁半里许,族中有樵苏禁,无有附者。去此则山水秀美,卜兆皆吉,买山之钱约数十千,曜东亦当商之族人,可不取值。”章太炎既知墓地已解决,即自书墓碑,以此向袁世凯表示混不畏死之意。墓碑极简,仅“章太炎之墓”五字,写成小篆,是他最擅长的字体,由于写时大义凛然,这五个字极是舒展,气魄宏大。但他的绝食却是为了对马叙伦尽朋友之谊而辍止了。据说是,马叙伦知道后,即邀同黄晦闻分别写信给李经羲,请李向袁世凯进行疏通,恢复章氏自由。